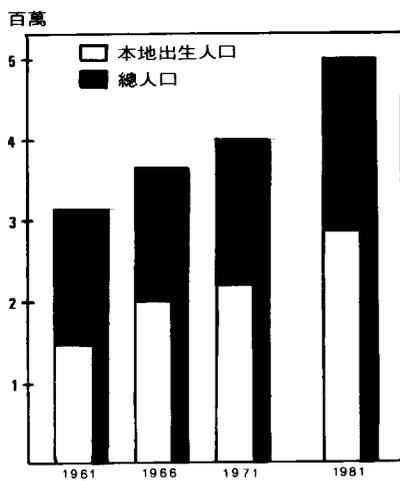


香港和中國大陸的一些語言現象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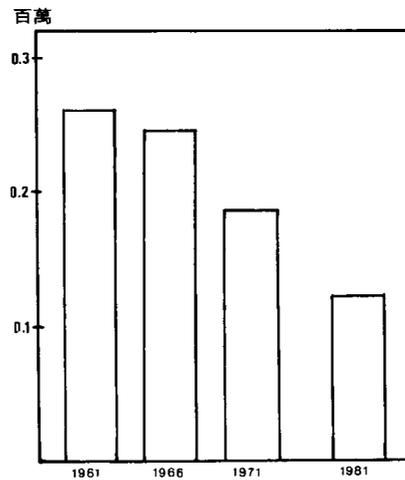
鄒嘉彥*

*香港城市理工學院副院長。本文據鄒教授1989年4月20日教授就職典禮演辭改寫。

無論從客觀或主觀角度看，香港在未來十多二十年間的改變，將會是開埠以來最令人矚目的。為適應未來社會發展，香港各方面都在演變，語言也不例外。究竟香港的語言將會循怎樣的路子演變呢？首先我想談談香港社會和語言關係的演變。從1961年到1981年，香港的人口不斷的增加，已從三百萬增至超過五百萬；在同一時期，本地出生的人口不斷上升，從一百多萬增至兩百多萬（圖一）。另一方面，香港人對香港的認同感，卻有下降的趨勢，這是根據香港人口統計有關的資料發現的。在1961年有二十多萬人自認籍貫是「香港」，到1981年這數字已下降到十二三萬左右（圖二），從這趨勢可以看出，好些人對香港的認同感在急劇減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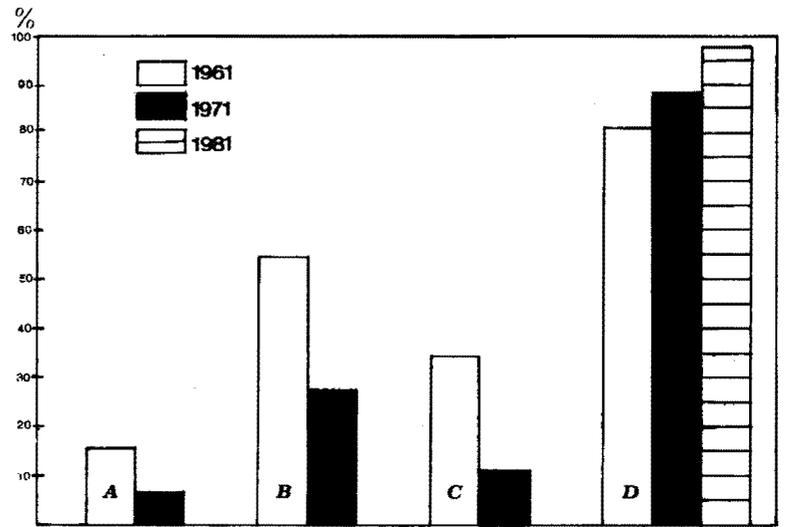


圖一：香港總人口和本地出生人口



圖二：自認籍貫為「香港」之人口

要了解這個情況，值得我們探討一下香港人在家庭中使用語言的情況。圖三綜合了1961和1971年從本港人口統計所得有關語言使用的資料。這個圖所顯示的，是本港家庭習用語言和他們所認同的籍貫之間的關係，由此可以見到本港家庭習用語言轉移的方向。根據本圖可以看出潮州人最保守，應用本身方言的，在1961年佔54.5%，其次是「外省人」（指兩廣以外的人），佔34.3%，再其次是四邑人，佔15.5%。然而到1971年這三個數字都下降了：潮州人降到27.6%，外省人降到11.7%，四邑人降到6.3%。方言使用下降，也就是趨向受廣州話同化，所以，全港用廣州話的人數百分比，從1961年的81.4%，上升至1971年的88.1%，到1981年更增加到約98%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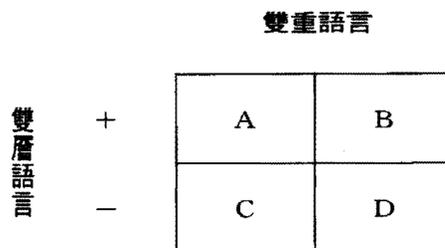


圖三：家庭習用語改變的趨勢：各種籍貫居民操本身方言的比例
(A 四邑人, B 潮州人, C 外省人, D 全港人用廣州話者)

綜合以上的統計數字，我們可以看見一個很強烈的對比：香港人口在增加，土生土長的人數在增加，語言同化的指標也在上升，然而自認籍貫為香港的人數卻在減少，香港認同感的指標是向下的。

要了解社會與語言的關係，尤其是香港社會與語言的關係，就先要了解「雙重語言」的現象。所謂「雙重語言」可以指兩種截然不同的現象。一種是從個人方面講，它指有些人有能力運用兩種不同的語言，這就是英語所謂的 *bilingualism* (雙重語言)。另一種則從社會方面講，是指某一個社會需要多於一種語言，因此出現兩種語言同時應用的情況。這種情況下，語言的應用有層次之別，造成英語所謂的 *diglossia* (雙層語言)。語言層次是什麼意思呢？以香港為例，一般人在家庭內所用的語言是粵語，而在比較正式的場合，則要用英語。例如簽訂合約就往往用英語，因為法律主要是依據英語版本的。同時，近年來英語在學校裏所佔的地位相對於中文來說是愈來愈重要。這些都顯示出，在香港社會結構裏語言有層次的差別。又譬如在傳統中國社會，書面語言是文言，和作為口語的方言大不相同，因此可以說，文言和方言顯示出層次的差別。

「雙重語言」和「雙層語言」這兩種現象的組合和相互作用可以用下面的略圖顯示：



A. 表示一個社會既具有雙層語言(包括方言)現象，同時也包含許多具有雙重語言能力的人。如香港、臺灣、新加坡等都屬這一類型。

- B. 表示社會出現雙層語言現象，但具有雙重語言能力的人並不多。例如四十多年前日據時期的香港，社會形成了新的雙層語言現象，日語成爲官方語言，但精通日語和漢語（即具有雙重語言能力的人）卻不多見。
- C. 這一型態不常見，它表示社會上存在具有雙重語言能力的人，但有關語言在社會功能上沒有層次的分別。在北美，早期大量歐洲移民湧現的時候，可能有不少人具有雙重語言的能力，但是這些語言並沒有特別的社會地位。
- D. 表示單一民族單一語言的社會，如太平洋一些孤島上的民族和社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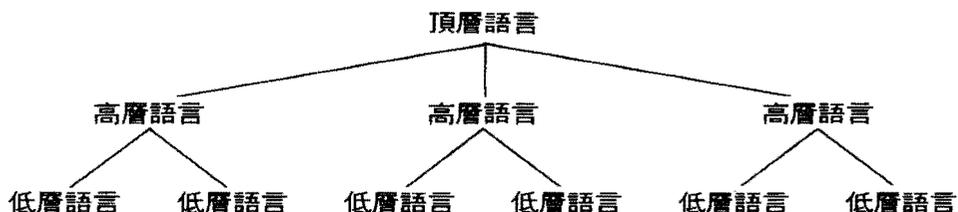
原則上B，C或D型的社會，都有可能演變爲A型社會。B型社會可以通過教育或社會經濟價值觀念的作用而演變爲A型社會。在C型社會中某部分人的社會地位改變，也就是他們的經濟或社會地位特殊化的時候，他們的語言自然也獲得特殊地位，這樣C型社會就會演變爲A型社會。至於D型社會，則可能因爲內部發展而產生方言，或由於向外發展，與外界接觸，而形成部分人和他們的語言較爲特出，由是發展到社會存在雙重語言能力的人（類似C型社會），或更進一步演變爲A型社會。

進一步深究雙層語言現象，就發覺它還應該細分爲雙層語言社會和多層語言社會現象。現在我們就試從上面所討論過的模式來看中國社會的實際情況吧！以傳統廣東社會來說，廣州話（或稱廣府話）在省城當然最重要；但即使在省城以外的地區，廣州話也佔很重要的地位。以演戲爲例，在廣東所演的都是廣州話的大戲，不會出現四邑話或中山話的大戲，也就是說，廣州話是處於比其他地區性小方言較高的層次。如果我們把視線從珠江三角洲轉移到長江三角洲，也有相似的現象。在長江三角洲一帶，上海話比起吳語其他地區性小方言來，明顯地較爲重要，處於較高的層次。由此看來，中國傳統社會在不同的地區所用的語言都有層次的區別，每一地區都有一種地位較高的語言，屬高層語言，是官方接觸和工作上普遍應用的。在高層語言以下，則有所謂低層語言，是在較小單位地區的家庭內和日常生活中應用的。以珠江三角洲爲例，廣州話是高層語言，四邑話、中山話等小方言是低層語言，就長江三角洲而言，上海話是高層語言，浦東、餘姚等地的小方言是低層語言。這現象可以用下面的示意圖來幫助了解：



然而，在這結構中，普通話的地位在那裏呢？回顧中國歷史，當中央政府強大的時候，京都對全國的影響很大，中央政府衰弱的時候，京都就失去對地方的影響力。例如在戰國時代、三國時代中國就被多個獨立勢力分據。因此，我們可以說，中央政府強大的時候，在各地區的高層語言之上，還有一種「頂層語言」。在過去百多年來，

中國的頂層語言就是普通話，也就是以前所謂的「國語」，或今日所謂的漢語。這又可以用下面的示意圖來表示：



從這角度看，中國社會是三層語言社會，但是這三層語言結構並非完全穩固的，它可以經過演變，回復到雙層結構。請先看下面表一，這是中國社會語言運用的粗略情況。

	用語領域	低層	高層	頂層
1	家庭	□ △		
2	民間文學	□ △		
3	購物	□ △		
4	藍/白領界	□ △		
5	基礎教育	□ (△)	(□)	△
6	中等教育	(□)	□	△
7	專上教育		□ (△)	(□) △
8	歌劇		□ (△)	(□) △
9	與中央級官員交往			□ △
10	與省級官員交往		□	△
11	與外地人交往		□ (△)	□ △
12	新聞廣播		□ (△)	□ △
13	詩詞			□ △
14	信件			□ △

表一 中國不同層次語言在不同領域中的應用狀況
(□代表傳統中國，△代表現代中國，括弧表示少量應用)

上表左邊列舉了十四種不同的語言運用領域，右邊的低、高、頂層分別指低層語言、高層語言和頂層語言。從上表可以看出，傳統上中國人在家庭及日常交往方面，大多用低層語言；而工作及文化活動方面，高層和頂層語言參半。近二三十年間中國政府全面推廣普通話，因此語言應用情況有很大改變。最重要的是高層語言的應用領域逐漸減少，頂層語言應用領域日廣，而低層語言則在很多方面得到保留。換

用語領域		漢語	粵語	英語
家庭環境				
1	與配偶		3	1.2
2	與子女		3	0.6
3	與父母		3	0.2
4	與兄弟姊妹		3	1
5	與鄰居		3	1
6	看報	2.5		2.8
7	其他休閒刊物	2.7		2.4
8	電視	0.4	3	1.3
9	電影	2	1	3
10	私人通信	0.5		2.7
合計		8.1	19	16.2
工作環境				
1	同事間、公務會議		1	3
2	其他場合交談		3	1.1
3	書信			3
4	報告			3
5	參考資料	1		3
6	與客戶、學生等在正式場合議事		0.7	3
7	與客戶、學生等在其他場合交談		3	0.7
8	公務訪客			3
9	給下屬便條	1.8		2.6
10	給清潔工或信差便條	3	0.5	
合計		5.8	8.2	22.4
其他環境				
1	法庭			3
2	電話公司		2.3	2.8
3	稅務局			3
4	向政府機關投訴			3
5	警察		3	
6	公共交通		3	
7	購物		3	
8	餐館		3	
9	流行歌曲	2.1	1.1	2.8
10	外地旅行	0.7	0.6	3
合計		2.8	16	17.6
總計		16.7	43.2	56.2

表二 香港不同層次語言在不同領域中的應用狀況

(「3」代表最常用，「2」代表有時用，「1」代表很少用，「0」代表不用)

特稿

言之，近二三十年來中國社會由三層語言結構逐漸向雙層語言演變。由此可見傳統的三層語言結構並不穩固，發展方向是回復到雙層語言結構，以普通話為高層語言，以其他方言為低層語言。過去的區域性高層語言變成低層語言，低層語言則仍保留原來的作用。

新加坡的情況和中國不同，它的頂層語言是英語，華人社會的高層語言是華語（普通話），低層語言是其他漢語方言，如閩南語、粵語等。但近年來政府在政策上有意盡量排除方言，只保留英語和華語，用意不外是使一個三層語言社會變回一個雙層語言社會。但值得注意的是，它並不像中國，要把區域性的高層語言降為低層語言，而是要排除原來的低層語言，從報導中可以知道新加坡政府這一個運動目前並不很成功，小方言並沒有消除，人民只是多學了一種語言——華語。

至於香港，語言現象相當特別。事實上，香港有兩個同時存在的雙層語言結構：一個是以英語為高層語言，粵語為低層語言的結構，這從英語和粵語在法庭裏的相對地位就可以看出來；但在單純華人社羣內則有另一個結構，以普通話為高層語言（特別是書面語），以粵語為低層語言。從社會上對以粵語作書面語的批評就可以證實這一點。

表二列出了 1976 年根據以香港小部分中上家庭為對象（包括商界高級職員、公務員、專上學院教員）所做的初步語言使用狀況調查結果。如表中注明，語言使用的多少是以「0」至「3」的數字作量化表示。這比表一所用方法較為精密，但仍只能算是大略估計，而並非徹底的分析。但是，綜合這些答案，對香港複雜的用語情況也可以得到一個概觀。

在家庭環境裏，粵語的使用佔優勢，但和英語差別並不太顯著；在工作環境裏，英語顯然絕對佔上風，但在其他環境裏，英語和粵語的使用又相當接近。整體來說，在中上家庭，英語的使用略高於粵語，漢語也有一定地位；至於書面漢語，則多在家內使用，比在「工作環境」與「其他環境」這兩個領域中更多。

進一步分析，可以看出英語主要是應用於公務或正式場合，粵語主要是用於非正式、非公務的場合。在有選擇的情況下，交談的語言若轉換了，那往往就代表談話性質的改變。例如：在正式場合，兩人本來用英語對話，其中一方若改用粵語，無形中就會把兩人的距離拉近，嚴肅的氣氛也可能緩和下來。相反地，在一個非正式場合，假如上司和下屬本來使用粵語交談，但上司忽然改用英語，那顯然表示他想把兩人間的關係疏遠，把交談「公務化」，有些打官腔的意味。

表二還顯示出下面兩個值得注意的現象：——

- (一) 同輩間（如配偶、兄弟姊妹、鄰居）英語使用指數是 1 至 1.2，比起本人與下一代間的相應指數（0.6）高出差不多一倍，比起與上一代間的相應指數（0.2）則高出多倍。這顯示從父母、同輩到子女這三代之間，英語的

使用和重要性正逐漸增加。

- (二) 就口語而言，粵語遠比漢語佔優勢，但就書面語和文化的層面而言，二者的地位就反過來了。

這三種語言的層次關係，可以用下面的略圖來說明。

高層語言



低層語言

根據《中英聯合聲明》協議，將來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主要部門的負責人員須由華人出任，這自然會漸漸促成中文地位的提高。至於英語的地位會有什麼變化，目前是很難判斷的，要看政府的語言和教育政策，以及香港、中國和國際間貿易、文化等方面的發展情況而定。雖然說香港將來要保持「五十年不變」，但從各種固有的因素可以看出，在語言使用上香港必然有變，問題只在於變化的大小而已。我們甚至可以預測，隨時代從《天津條約》進展到二十一世紀，香港中文和英語的很多相對地位可能發生「風水輪流轉」的現象，而粵語與普通話之間的相對地位也可能形成新的趨勢。

參考書目

- ① Afrendras, E.A. & Kuo, E.C.Y., *Language & Society in Singapore*,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, 1980.
- ② Baetens-Beardsmore, H. *Bilingualism: Basic Principles* (2nd), Multilingua Matters 1, Avon, U.K., 1986.
- ③ De Francis, J. *Nationalism & Language Reform in China*, New York, Octagon Books, 1950.
- ④ Kvan, E. *The Problems of the Bilingual Milieu in Hong Kong*. In I. Jarvie & J. Aqassi (ed) *Hong Kong: A Society in Transition*, Routledge & Kegan Paul, 1969, pp 327-44.
- ⑤ Fishman, J.A. *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*, Mass., Newberry, 1972.
- ⑥ Ts'ou, B.K. *Language loyalty among minority groups in Hong Kong*,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sian Round Table Conference in Chinese Language & Linguistics, Hong Kong, 1976.
- ⑦ Ts'ou B.K. *Some current issues relevant to language and education in Hong Kong*. In P.M. Whyte (ed), *Educational Career in Hong Kong*, Hong Kong, Appointments Board, University of Hong Kong, 1977, pp 47-53.
- ⑧ Ts'ou, B.K. *Critical sociolinguistic realignments in multi-lingual societies*. In E.A. Afrendras (ed). *Patterns in Bilingualism*, Singapore,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, 1980, pp 261-286.
- ⑨ Ts'ou, B.K. 《語言炸彈》(with R. Lord), Longman Group (Far East) Ltd., 1985.
- ⑩ Ts'ou, B.K. 《1997年前後香港的中英語文規劃問題》，「文化傳統與當代教育：教學、課程、與政策」國際研討會，香港中文大學，1988。
- ⑪ Ts'ou, B.K. 《海外漢語方言分佈與華文教育初探》，《第二屆世界華文教學研討會論文集》，臺北，1989。
- ⑫ Yau, S.C. *l'attitude de la jeunesse face a la politique linguistique de Hong Kong appes son retour a la Chine en 1997*, *Language et Societe*, No. 47, 1989, pp 87-102.
- ⑬ Wu, Y.H. 《新加坡的社會語言》，新加坡，新加坡教育出版社，1978。